



记录大师的生命体验，
找寻历史的真实记忆

访谈录
The Masters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腾讯新闻
NEWS.QQ.COM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师访谈录/腾讯新闻频道主编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0. 4

ISBN 978-7-5438-6425-2

I. 大… II. 腾… III. 名人—访谈录—中国—现代
IV. K820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35784号

【版权所有, 请勿翻印、转载】

大师访谈录

腾讯新闻频道 主编

出 版 人: 李建国

责任编辑: 曹伟明 何学雷 龙昌黄

特邀编辑: 母飞鹏

装帧设计: 彭意明 段颖婷 张卓明

出版、发行: 湖南人民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
地 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

邮 编: 410005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 长沙宏顺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印 次: 201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17

字 数: 310000

书 号: ISBN 978-7-5438-6425-2

定 价: 30.00元

营销电话: 0731-82226732 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

- 001 沈昌文：从小校对到出版家
- 023 江平：永远的江校长
- 045 陈光祖：与中国汽车工业同行
- 057 方成：漫画人生
- 079 吴祖强：踏乐而来 音乐人生
- 111 张丽珠：神州试管婴儿之母
- 129 马志明：通俗文化的雅士 相声江湖边的隐者
- 169 夫妻翻译家：杨宪益和戴乃迭
- 185 陈佳洱：永远的北大情怀
- 215 许耀南：雕刻时光
- 233 草婴：从翻译作品中汲取生活的力量
- 245 汤一介 乐黛云：未名湖畔学界双璧

沈昌文： 从小校对 到出版家

在出版界，他是一个灵魂般的人物。

在读书界，他是一个旗帜性的人物。

他用二十个字来概括自己的编辑生涯：吃喝玩乐、谈情说爱、“贪污盗窃”、“出卖情报”、坐以待“毙”。

他所主编的《读书》曾引领了整个思想界的解放。

他，就是沈昌文。

12月9日，腾讯新闻中心“大师”访谈独家对话出版家、前《读书》杂志主编沈昌文，以下为访谈实录：

晓虹：我想先从《读书》开始聊，我前两天在看您的书的时候发现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，据说当时在知识分子中曾经流行一句话：“可以不读书，但是不可以不读《读书》。”

沈昌文：那不是我的话，那是北大的一位先生说的话。他还写了一篇文章。

晓虹：当时《读书》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办的呢？

《读书》——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

沈昌文：《读书》不是我创办的，甚至可以说我没有参与创办，《读书》是几位老前辈创办的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——就是1978年10月份、11月份以后，正好在30年前了，那些老前辈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很受鼓舞，所以出版界的几位老前辈——首先一位叫陈翰伯，是北京长大的苏州人，是燕京大学的学生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革命先驱，一直做革命工作的，他是老革命。还有一位叫陈



《读书》杂志前主编沈昌文 杨金涛摄

原，他是广东人，也是老革命工作者。他们两个人，当时还有一位是三联书店的范用，范用现在还在，两位陈先生都过去了。范用先生年龄比我大8岁——我78岁他86了，他们几位合计要办一个杂志，为什么呢？

陈翰伯、陈原从40年代以来办过很多杂志，都是关于书的杂志，就叫《读书》。书名40年代叫《读书》，50年代还叫《读书》，50年代的时候陈原是国家出版管理局的局长，他也主管过读书杂志，所以他们又想创办，也可以叫恢复这个杂志。

他们确定这个杂志的宗旨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，就是不完全是书评杂志，他们所办的要比书评杂志再往前走一步，思想评论，为了跟书挂钩，所以叫做“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”。

“老干部”、“老右派”、“冯二哥”、黄毛丫头组成的编辑部

1978年底开始筹备，到1979年4月创刊，4月份的时候出版第一期，他们找了几位老的编辑，最主要的三位，一位叫倪子明先生，倪子明也是三联书店的老前辈，也是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的老干部，还有两位是民主人士，一位是史枚先生。

史枚先生是老共产党员，可是后来他被除名了，那个时候是民主人士，不但是民主人士，我们年轻人背后叫他“老右派”，因为他是我们出版系统里边著名的右派分子，可是按党龄来说他比谁都老，四几年的时候他已经在上海干革命了，而且担任过上海沪东区委的书记，40年代初的时候，他的革命战友是“敬爱的江青同志”。那个时候江青还没有到延安，还在上海，还没有入党，而他已经是党员了。

他担任这个刊物的主编，主要工作是他做。因为其他几位都另有任用了，虽然创办了一个杂志不能亲自去编，他们只能够担任名誉上的事情，名誉上挂名叫主编、副主编等等，执行主编就史枚先生。

另外还有一位执行副主编就是冯亦代先生，冯亦代是著名的民主人士，是外文出版局的，他的外号叫“冯二哥”。

晓虹：为什么叫“二哥”呢？

沈昌文：听说是“二哥”。我不大懂北京话，我北京（虽然）来了60年。北京话里边有什么困难的事情找“二哥”去解决，他专门在文坛喜欢排难解纷。据说就是那样，并不是排行第二。

晓虹：就是说非常有义气的那种人。

沈昌文：对，非常有义气的，我们宁波话也有这个话，不叫“二哥”，宁波话叫“娘舅”，有什么事难了找舅舅去。冯亦代先生他是外文局的，也是所谓老右派，当年那个时候都已经不是这个身份了，可以出来工作。这样他们几位编辑的力量是非常强，这其中有一位就不得了了，还有一位是画漫画的丁聪，所以组成了一个编辑部。像现在我们有资格的编辑，像三联书店的前任总经理董秀玉，还有《读书》杂志前任主编吴彬，当时都是小黄毛丫头。吴彬是吴祖光的外甥女，安排她慢慢来学习的，所以编辑力量非常强。

沈昌文：我当时没参加，我也在一个大单位里边，可是我没进编辑部。

晓虹：是在人民出版社。

沈昌文：后来人民出版社为这个成立一个三联书店编辑部，因为三联书店从1951年8月以后就不是一个独立单位了，就挂在人民出版社里边。1980年成立三联书店编辑部以后，我就担任编辑部的主任，这样我就进来了。这样也跟《读书》发生关系了，以后担任《读书》的副主编，当时史枚先生过世了。史枚先生过世，我在书里边写了非常凄惨的故事，这个老先生，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是这么坎坷，可是他还要始终对我们党，对政府提意见，就不怕，你怎么划他为“老右派”，所以又提了一个意见，又挨批了，当天晚上去世了。

他去世以后我担任副主编，冯亦代先生他们都另有很重要的工作，这样我差不多从1980年3月进的《读书》杂志编辑部，就是成立一个三联书店，《读书》杂志在里边，从1980年5月以后，我就具体负责了。我当主编还要晚一点，是1986年1月当主编，一直当到1995年12月底，到1996年1月我就吃喝玩乐了。大概就这个情况。

从小校对到出版家

晓虹：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评价，包括您可能也面对过很多次这样的问题，大家都在说，说《读书》分为三个时期，一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陈翰伯、陈原先生还有范用先生的时期，还有一个是沈昌文时期，再有就是后来汪晖、黄平时期，他们都说您主编时候的《读书》是最好看的。

沈昌文：那个时候不是我有能耐，我是最没能耐的编辑，为什么呢？我没编过杂志，而且我很少编书，我尽管在出版社很多年了。我是一个工人，我以工人身份参加到（革命队伍），有点假冒伪劣了。我第一次考三联书店，三联书店不让我考，说你没学历，我认为我是革命工人，我喜欢文化，三联书店一定很欢迎，那是1949年，他说你没学历，我大为懊丧，在上海，我们这种上海的小鬼要取得学历很容易了，等过一两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招考的时候，我不但有大学学历，而且有关证明信证明我是某一个报纸的记者，这样我就考取了。

晓虹：我看您的自述里边讲到了，证明信是您作假做来的，刻了一个萝卜章是吗？（笑）

沈昌文：是。我开头做校对，我做了3年零4个月校对。我说我懂俄语，要说懂，我其实没有资格懂，不过我翻译了不少东西，我翻译俄语的东西，俄语关于出版工作的东西当年需要，也是领导上发现我居然当时叫“人才”，其实不是人才，确实是发觉一个校对员居然能翻译东西，这样我出版了书了。

我第一本书叫《出版物的成本核算》，翻译这些书是什么原因呢？也很简单，懂俄语的人不懂出版，更不会去翻成本核算的书，懂成本核算的人不懂俄语，我在中间取了一个巧，以后我又翻译了一些别的书，又翻译了一些论文，所以没多久，我就被提拔了。正当我的学历假冒被暴露、要把我遣送回上海的时候，我的作品出版了，于是又说这个人不应该遣送，这个人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，于是我就被调到编辑部而且当上了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，给我这么一个荣誉的称号。然后很快工资从31块调整到99块。我就很高兴了，我还有稿费收入等等，这样我当了秘书以后我做编辑工作，我回到刚才说的，我喜欢的是做翻译，因为我在上海除了俄语以外，我还学过世界语、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日语等等，所以我做翻译书的编辑比较喜欢，等到编杂志的时候完全外行，不但外行，我刚才说了，编书我都外行，那我从头学起。

附：

沈昌文先生译作：《控诉法西斯》（季米特洛夫）、《列宁对全世界妇女的遗教》（蔡特金）、《阿多拉茨基选集》（部分）、《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

党而斗争的历史》（部分）、《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》（部分）、《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斯坦主义》（部分）、《出版物的成本核算》等。

《读书》编辑们的三无——“无能、无为、无我”

晓虹：您刚才说自己此前没有编过杂志，所以抱着一颗非常谦虚的心，王蒙在您《阁楼人语》的序言里边提到这么一层意思，他说“《读书》之所以成为《读书》，主要是因为该刊的编家突出了三无，即无能、无为、无我”，您刚才已经说了，自己非常的谦虚，另外这两层意思能不能给我们再说一下呢？

沈昌文：再早一点，我学习编辑工作是从1954年的时候调到人民出版社做领导秘书开始的。那个时候人民出版社有一个大的变化，成立了三联书店编辑部，还成立一个叫世界知识编辑部，这两个编辑部现在都是出版社了，当年没有的，当年都只有一个名字挂在人民出版社里边，当年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根本没在外交部，不像现在这样的。这两个编辑部里边有大量的人才，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——我不知道当时中央的方针——派了大量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到这些编辑部来。

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应该说我们党有一些在编辑工作中怎样对待知识分子的方针，这个我受到感染了。这个方针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，叫做“作家是我们的衣食父母”。

原来出版社是不大重视作家的，因为作家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我们组稿先到一个单位人事部门去了解，人家说这个人有什么历史问题、政治问题，我们出他的书好像都是照顾他的事情。可是那个时候提出来一个口号叫做“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”，我受很大的启发。

晓虹：它开始提到有服务意识了，转换了思路。

从对作家“翻箱倒柜”到与作者“谈情说爱”

沈昌文：转换思路。所以我们才开始有以后的“无我”这些，我这个编辑主角是作者创的，不是我们创的，我们只不过是配角，配合他们把工作做好。这是一个，另外一个上面提出来，上面是谁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在当年学习到了，要作家“翻箱倒柜”。

晓虹：为什么要“翻箱倒柜”呢？

沈昌文：凡是一个作家，其保存的东西太多了，因为当时1950年特别提到，很多作家不敢在1949年以后把自己过去的作品拿出来，我们要让他把这些作品都拿

出来发表，这样我受了很大的教育，所以等到我主持《读书》杂志的时候，我运用了这些资源，而且又在这些老前辈的帮助之下开始知道如何对待作家，也就是说不要在作家面前指手画脚。

为什么？这很简单，不是过分的谦虚，你这个编辑再有天才，你只能研究一个学问，而且这个也不可能，而作家是一辈子都在研究。你要访问一个明史专家，那你自己不自己承认你的简陋，你怎么能够跟他谈得拢呢？这个我在1954年的时候就开始知道这些。

比如说跟各方面的作者打交道的时候事先要做准备工作，今天来说很简单，用今天的办法，就是查一下百度，查一下Google。当时不是，当时要到资料室里看书，我明天要找一个作者谈清史，要谈美国的事，我都要了解，我要花一两天，两三天甚至一个礼拜工夫把有关的资料都看了，做了笔记，然后我到那个时候有话好讲，也不是讲，主要是听。

要他讲的东西听得懂，听得懂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不能够都表示Yes，然后才能够做好这个工作。

因为对我们这个编辑部来说，我到八几年以后算是高级领导了，可是我是工人，吴彬是工人，董秀玉是初中学生，我们都没多大水平，全靠自己学习。当然更主要的不是我们的工作，也不是我们的“无为”，也不是什么，而是当时的大气氛，当时的气氛使得知识分子起来说话，前所未见的，现在看起来真是（让人感慨）。从来不说话的，我举的最多的是金克木先生，金克木先生在著作界是有名的难办的人，因为他学问广，他的架子大，可是跟我们亲近极了，你只要跟他谈得拢，他简直是非常亲切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书上经常举的，临走的时候，手把着门环还要讲至少15分钟，讲不完了。

组他的稿子，我跟赵丽雅一起去的，请他写一篇稿子，他马上就寄来五篇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鼓舞之下，我们的知识分子全动作起来了。都是当年对我帮助非常大的一些老知识分子，金克木、张中行，对我们是恋恋不舍，把工作做下来，我要强调的主要是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是太幸福了，我赶上了，不是我有能耐，我赶上了这个时代，我的命好。

晓虹：因为我是1978年出生的，那个时代对我来说可能要从史书当中去看一下，我大概会知道一些事情，比如说1949年是中国成立，然后到19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，1966年到1976年之间又是十年浩劫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实际上没有经历，我们碰触不到，但是我听到您讲述，我就觉得为什么像您说的那样，《读书》之所以成为《读书》，是因为大家都在前期那段有了很多的压抑，然后在那个时代冷不丁

地就开始爆发出来了。

沈昌文：你简直想不到，你们都没有经历过，1966年的时候我们出版社的编辑给作者贴大字报，我们到作者那儿查了，说这个作者是地主阶级出身的，于是给他贴一个大字报，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，你历年从我们出版社已经拿走了稿费多少多少万，现在勒令你在一个礼拜之内交还。所以这怎么能搞好和作者的关系呢？

然后更严重的还有把作者揪来斗，跟本单位联系好了，说作者某本书是“毒草”，我记得当年有一本书是康生点名的是“毒草”，然后我们出版社就把作者从近代史研究所揪到出版社来斗争，出版社里边的造反派跟他这个单位的造反派一起揪斗，所以这怎么能搞好和作者的关系呢？

很快，过了十几年，这个情况改变了，有过去的印象在，无论作者，无论我们，大家都很好相处，都很能做工作。

当然尽管这样，还要显得做一个编辑不要太无知。我老跟大家说的一句话，我跟我的同志说，现在说的是要查Google，过去不是，用林彪的话叫“急用先学”，明天要访问谁了，今天先把书看好。

晓虹：但是我倒觉得，虽然是这样子，但是您在那个阶段里边看了好多的书，我听说人民出版社的资料室都被您翻了一遍，这种“速食”给您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？虽然说是“速食”的，但是您在这其中功夫也确实是做到了。

沈昌文：是，这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我在人民出版社对资料室比较熟悉，我全是靠这个资料室为我撑腰，我经常去，我就很熟，当时的领导是比较开明的，主张资料室开架。本社的工作人员可以自己去翻阅，可以去查，这样我就做了好多（工作）。

当然了，我还有一个长处就是我能够看的外语比较多，所以我能够经常看到一些别致的事情，大家都以为我很有学问，其实没有，我只不过因为（懂外语）我外语不会说，可是能看，德语、英语、俄语、日文我都能看，我能看出一点东西来。

“读书无禁区”标题修改始末：范用授意、史枚执行

《读书》于1979年4月正式创刊，其创刊号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——一位名叫李洪林的作者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读书无禁区》的文章，直言“文化大革命”对文化的摧残，提出人民有读书的自由。由于文章观点激进，加之李洪林中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干部的微妙身份，有关部门就来过问此事。但此文一出，引起

书界震动，《读书》因此名声大噪。（编者注：摘选自《大家》）

晓虹：当时《读书》第一期有一篇文章叫做《打破读书的禁区》，刊发的时候好像被史枚先生改名为“读书无禁区”，今天回过头来再来看这个口号您认为它的意义在哪儿呢？

沈昌文：首先说一下，这个改动究竟谁改的，范用先生说是范用先生改的，我的文章里说是史枚先生改的，我现在应该说恐怕是范用先生改的，不过我也有根据，我的根据就是原稿，原稿还在我家里，确实是史枚的笔迹。

为什么又说是范用先生改的呢？因为范用先生是不管具体的改稿子的，他是高级领导，我想是他说过话了，“你把它改改”，你们现在报社大概也还有这样的高级领导吧，把这个标题改改，开个会下面就改了，所以从笔迹上去看是史枚先生，实际上是范用，我想应该都对，这是第一。

第二，当然改了以后，有点不大精确，可是在编辑来说，这个改了以后是有号召力的，而且一个标题里边不可能说得很全面，它的全部的思想在文章里边说得很清楚，文章里边其实有很明确的交代，“读书不能没有引导”，所谓“不要废除禁区”，不是说读书不要引导，要进一步更好地引导，所以这个也还是对的。

李洪林先生最近在北京，他在《炎黄春秋》写了文章了，讲了这个部分，我觉得讲得挺好。当时我还没有到《读书》杂志编辑部，可是现在回顾这个事情，我觉得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。

从“读书无禁区”到“图书馆必须四门大开”

沈昌文：我特别提醒朋友们注意，第一期发表了这篇文章以后，第二期又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叫《图书馆必须四门大开》，“图书馆”这三个字它不是用的“图书馆”，是用的图书馆常用的一个符号，就是一个大“口”字里边放一个“书”——现在我不知道了——图书馆的简称（符号）就是这样的，一个大的口里边一个书，他用了这个字，他认为这个符号讲得很含蓄，这个符号有缺点，把这个书全关在一个方框里边了，图书馆应该四门大开，就是要把四边的门都要打开，实际上就是反对图书馆要禁书。

晓虹：从“读书无禁区”口号的提出到一个符号被赋予的含义。

沈昌文：因为书封了以后，图书馆的书更不让人看，年轻人看不到图书馆的书，图书馆都不让进，所以他反对这一点，这篇文章也很有意义，我特别跟你介绍这篇文章的署名叫范玉明，范玉明是谁呢？其实就是当年的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，他现在的笔名就叫严修，现在他还活着，他身体还不错，90多岁了，为什么这

篇文章署名叫范玉明呢？意思就是反对愚民政策，“反愚民”。

这篇文章是对“读书无禁区”的一个呼应，“读书无禁区”是讲出版，它是讲图书馆，意思就是一个，就是说要给大家看书。当然了，李洪林那篇文章，因为他当时是中宣部的理论局局长，所以掌握很多材料，掌握了很多当时的书界的情况，你看了以后觉得可以了解很多事情，而且他特别了解的一条就是他的地位更了解了，就是伟大领袖自己看书是主张无禁区的，我们60年代我也做这个工作，就是他要看什么书，指定人民出版社印大字本，我们就赶紧去印，什么都可以，“子不语”、“金瓶梅”，都是。

晓虹：这些书在当时都是“大毒草”。

沈昌文：所以李洪林先生包括曾彦修先生都是非常有学养，都不是随便说说的，文章有很大的影响，这个文章出来以后有很大的反响，后来说是有错误，要我们作检查当时我是编辑室主任，我正好是管作检查的，所以让我去参加了几次作检查的会，挨批评。

为《读书》做检查心得：适当上纲上线，不要讲太多细节

晓虹：听说您作检讨很有一套，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呢？

沈昌文：我主要是做秘书出身，所以比较善于考虑这些问题，特别是作检查要掌握一条，就是要适当的上纲上线，可是又不要太多地讲细节，讲细节讲多了的话，或者变成辩解了或者是起了副作用了。

我记得1952年，我在做校对的时候，我们一个年轻编辑，他在男女问题上出了一点毛病，于是要他作检讨了，他作了检讨，非常深刻，深刻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两个人怎么好，这个恋爱本来已经是要他作检查的了，他非得谈恋爱是怎么谈的，两个人感情如何进展的等等，于是最后起的作用不是在检查错误，而是宣传恋爱至上。

所以我们当时这些20来岁的小青年激动极了，马上就来学习这些东西。因为想知道他们两个人是怎么恋爱的呢！原来他们看了屠格涅夫的一个小说叫《初恋》——我是搞俄语的，我特别懂得这篇小说，看了以后，又看别的小说——于是这位先生老去问年轻的女士，这个小说里边为什么他说了一句话以后，这个女的要脸红呢？这个女的就告诉他，于是两个人就慢慢越谈越深入了。于是我们一下子就把图书馆里边屠格涅夫小说都借空了，大家没事都研究屠格涅夫的小说，中间有哪些动人的地方可以吸引异性的注意。

晓虹：您那个时候恋爱了吗？

沈昌文：我那个时候还没有，正在想恋爱。

晓虹：所以先拿这些当教材先来实习一番。（笑）

沈昌文：所以可见作检查是有各种检查。我后来当了秘书才知道作检查不能那么做，而是不要那么描绘，要适当上纲上线，《读书》的检查更有一个情况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准备好了检查，我去了两次检讨的会，会上都是检讨一个时期的书的情况，书刊的言论等等，都没让我发言，我最后没检查，没有发言，就算通过了。

当时整个的大情况是一个改革的形势，所以有一个时期看起来一件事情在一个阶段好像是出了问题，事实上最后都慢慢过关了，这个是非常好的。

真正过关又是后来了，我已经在书里边说过了，就是《读书》杂志上面都在考虑了，老有风声说了，《读书》杂志让它停刊，胡乔木在一个别的会上讲别的问题的时候，忽然讲，《读书》杂志还让它办下去吧！胡乔木讲《读书》杂志要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，这个很容易办到，而且我们以后也知道了，用马列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思想宣传改革开放是最有效的。

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出版《情爱论》和《宽容》

所以我以后做了一本书，这本书我非常得意地印了120万册，使得三联书店的经济也获得了很大的改善，这就是马克思的思想，叫做《情爱论》。讲情爱，讲肉欲，这是（当时）非常犯忌的事情。

我看了这部俄文书，我激动得不得了，这个作家是保加利亚人，用俄文写的，他引了很多马克思的著作，他的论点就是说，马克思从来没有否定过肉欲，而且肉欲是爱情中间的唯物主义的基础，那我们谈马克思主义什么都要谈唯物主义，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，马克思无非是辩证唯物主义，唯物主义不是绝对的，而是辩证的。所以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，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怎么能否定肉欲呢？怎么一谈起肉欲就好像犯罪？

晓虹：就好像是很肮脏的事情似的。

沈昌文：事实上革命的领导人本身自己不仅是做，而且是谈论过很多肉欲的，他的那本书出来，我立刻找人翻译，翻译的是我同学，几个老朋友，老同学一下子翻译出来，一下子，这就是用了上面说的方针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宣传。

晓虹：然后这本书就很顺利的出版了。

沈昌文：印了120万册，而且我又被评为先进了，所以以后懂这个窍门了，以后知道了做事情该要怎么做。你不能够赤裸裸地说肉欲万岁，那不行。

晓虹：得给它找一个盖子。

沈昌文：事实上马克思主义，它应该最通情达理的，他如果不通情达理，就不能够得到胜利。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情跟理说出来，大家就了然了。

晓虹：非常清楚地告诉你，我为什么这么样做，我这样做是有根据的。

沈昌文：像这本书的第二本，譬如说《宽容》也是这样，《宽容》印了56万，因为当时三联的经济情况不好，我告诉你，三联书店成立的时候算总店了，北京的叫总店，香港是分店，总店的总经理到分店去视察工作，我总店的资产当时是30万，我到了香港分店一看人家的资产是8000万。

晓虹：总店和分店有这么大的差距。

沈昌文：是，所以必须要认真学习迎头赶上，这样我慢慢地就印了一些书，借了一些钱。

晓虹：三联现在这个楼也是您当时在任的时候盖的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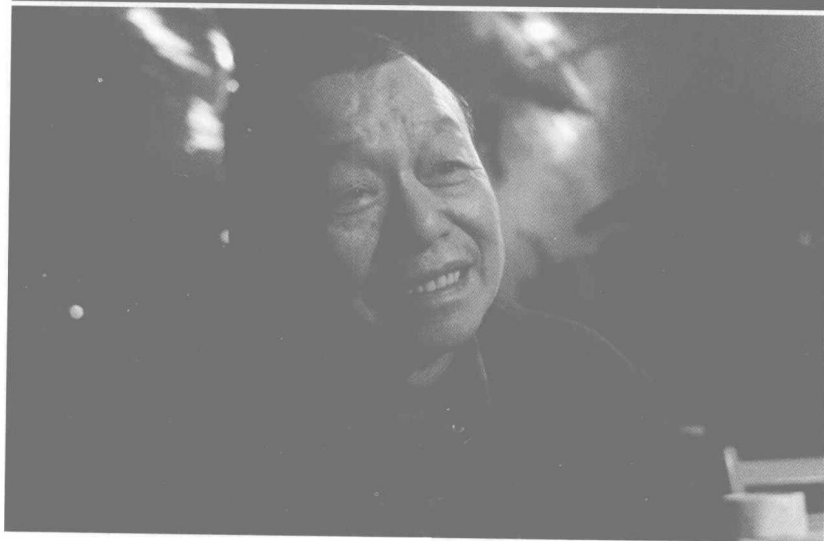
沈昌文：当时我们没有房子，当然要感谢，我昨天就见到了这位先生（吴江江），就是现代出版社的社长，那个时候是新闻出版社的计划财务处处长，他给我花的力气，他给我张罗的。高级机关的官员能够帮助下属单位张罗这些事，那是很难得。

出版社要做广义的文化事业

晓虹：我们在谈到《读书》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个这样的印象，当时它开创了很多的第一，比如说《读书》服务日，包括它谈到的四个“没有”（没有主题，没有主持，没有开始，没有结束），《读书》服务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建立的呢？

沈昌文：这个我有一个观点，我这个观点现在还是这样看，做出版社不能够单纯考虑出书然后销售等等，这个太简单了，出版社是一种文化事业，三联书店从邹韬奋先生开始一直都这样，不仅三联书店，商务印书馆也是这样，我要主张做广义的文化事业，而这个特别是我的几位前辈（所提倡的），我想举一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（为例），1949年以后的胡愈之先生。

胡愈老，大家都知道他是高级民主人士，其实他是秘密党员，现在都知道了，他是老共产党员，胡愈老当年就是非常主张做出版社要做广泛的文化事业，群众的要服务，要通过文化活动来服务，所以我记得到了60年代中期，我追随他编一套书叫《知识丛书》，当时经过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发觉我们缺乏知识，当时胡愈老率领我们大家，他就跟我们多次讲要注意这方面的事情，所以我开始学习。



《读书》杂志前主编沈昌文 杨金涛摄